

出版 30 年，难忘那场丛书“盛宴”

因改革开放而复活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本报记者 张贺

有这样一套书：30 年的岁月流逝并未使读者忘怀，其经典地位为后来者立下标杆；在网上，许多读者自发组成讨论组，交流读书心得和收藏体会；这批当年定价不过一两元的旧书最高拍卖价格竟然到了上百元；这套书的封面一直是朴素的浅绿浅灰套网格，因此被亲切地称为“网格本”，收集一套完整的“网格本”成了许多人的梦想。它就是由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这套丛书诞生以来的命运与当代中国一样历尽曲折。“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这套丛书是不可能复活的，”谈起《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已经退休的原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任吉生仍然很激动。作为丛书“工作组”最后一位召集人，任吉生见证了丛书在改革开放之后重获新生的命运。

这套丛书的出版设想早在 1958 年就已提出，当时中宣部责成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这项工作（1964 年外国文学研究所成立后即从文学研究所接过了这项工作），并将出版任务交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后来编委会在讨论中，提议增加《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合称“三套丛书”。由于出版任务加重，又商请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承担。到 1961 年，编选计划初步制定，部分译者和序言作者已经确定，正当一切有条不紊进行之际，“文革”突然开始，出版工作被迫中断。从 1966 年到 1978 年，整个编译出版工作停顿了整整 12 年。

肇始于 1978 年的改革开放如春风吹散了阴霾，经历浩劫的人们读书热情空前高涨，而外国文学尤其成为读者追逐的热点。在此情况下，中宣部批准恢复“三套丛书”的出版工作。这批外国文学名著的推出一时成为“书坛盛事”。当时任吉生刚从地方分校回家就从朋友口中得知，许多读者为了买到一本新出的名著竟然连夜在新华书店门口排队，许多书还没等上架就被一抢而空。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董衡巽说，丛书出版以后，读者反映极佳，有的不断来信要求购买全套。当时正在北大中文系读书的查建英回忆说，“人人都在疯狂恶补所有的文学名著，当时图书馆还没开架，外国文学阅览室永远要排队，不能外借，大家就挤在木板凳上看那种大部头书，从开门看到关门为止。在书店里面，只要一有新的古典文学名著、外国文学名著出来，马上就排长队，立刻售罄。这是空白之后的一种爆发，人们对书的欲望、激情真是又美丽又悲哀。”一位网名叫“数帆老人”的网友说，“1978 年初的某一天，是预定发售第一批外国文学名著的日子，我哥哥起了一个大早，赶到新华书店排队购书，等我放学回家，一堆崭新的书已经等着我去东摸摸、西翻翻，爱不释手了。其实当天发售的书并不多，记忆中只有《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悲惨世界》、《艰难时世》、《易卜生戏剧集》、《曹禺话剧选》几种，只是哥哥下手狠，每种都买了三本，大概是让我们兄弟三个各持一本吧，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当年久旱逢甘霖的狂喜如今的人们很难理解了。”

读者之所以如此热衷这批名著，除了“久旱逢甘霖”的因素之外，这套丛书选题精当、译笔上乘也是主要原因。《丛书》几乎囊括东西方各民族自古代、中世纪至近现代的思想艺术均臻完美的史诗、诗歌、戏剧、小说等体裁的杰作，基本上集外国文学精华之大成。多年以来，这个选题几乎成了外国文学出版界的准绳，近 20 年我国各地出版了多种外国名著丛书，极少超出这个选题的范围。今天翻看译者 and 编者名录：卞之琳、戈宝权、叶水夫、冯至、包文棣、田德望、朱光潜、孙家晋、孙绳武、陈元元、杨季康、杨周翰、杨宪益、李健吾、金克木、罗大冈、季羡林、郑效洵、闻家骢、钱钟书、钱学熙、楼适夷、靳斯嘏、蔡仪、巴金、赵家璧、绿原……真可谓名译名编、大家云集，令人顿生高山仰止之叹。

而尤其令人敬佩的是这些专家学者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治学风格。为成一书，常常耗时数年乃至十数年。董衡巽说：“这套书的翻译质量真是相当好，几乎都是名家名译。他们的外文功底不用说，就是中文修养也是出类拔萃。当时译者的责任心很强，一句话、一个短语都要反复推敲，务求信达雅。杨必翻译萨克雷《名利场》的时候，为了书名如何译得贴切传神而苦恼，向钱钟书先生请教时，钱先生说，‘译成《名利场》最好’。今天看，这个书名的翻译真是神来之笔。”

从书译者杨绛翻译《堂·吉珂德》的过程在今天看来简直是传奇。杨先生精通英语、法语，但不会西班牙语。当时国内虽然已有《堂·吉珂德》中译本，但都是从英法文本转译而来。为了忠实于原著，已经年近 50 的杨绛从头开始学习西班牙语。令人惊叹的是，仅仅两年之后，杨先生竟然可以熟练阅读西班牙文原著。凭借对原著精神的准确把握和深厚的中文功底，杨译《堂·吉珂德》准确自然、流畅优美，今天已成大家公认的名译。

任吉生说：“虽然现在有人批评丛书的翻译语言今天看有些过时了，但是和这些年出的同类译本相比，丛书中的译本绝大多数仍是第一流的，有的甚至是不可企及的。”在劣质翻译大行其道，粗制滥造的冒牌翻译层出不穷的今天，这批精品显得格外珍贵，也带给人们诸多启示。

专家座谈《贺敬之研究文选》

《贺敬之研究文选》出版座谈会近日在京召开。贺敬之是我国现当代著名作家、诗人和文艺理论家，自上世纪 40 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70 年间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贡献了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其中新歌剧《白毛女》（贺敬之主笔）、诗歌《回延安》、《放声歌唱》、《雷锋之歌》、《三门峡——梳妆台》、歌词《南泥湾》、《翻身道情》、《平汉路小调》等，早为人们所耳熟能详。

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中国艺术研究院陆华编辑的《贺敬之研究文选》，分上、下两册，共 138 万余字，收录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外关于贺敬之及其文艺作品、文艺思想的重要研究成果，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数十年来“贺敬之研究”的总体状况，为学界进一步推进相关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张健）

中国社科出版社三十年精品迭出

诞生于改革开放之际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今年迎来 30 华诞。

1978 年由胡乔木同志提议、经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成立的中国社科出版社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伴随着中国的高速发展，经过新老几代员工的辛苦努力，到今天已发展成为一家有亿元以上资产规模、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力的人文哲社会科学学术出版机构，并首批荣获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全国优秀出版社”称号。30 年来，中国社科出版社总共出版了约 8000 种图书。这些图书的出版对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学术研究的繁荣与发展、人才培养和学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国际间文化交流等，起了很大的作用，赢得了读者的广泛好评。

（杜庆）



2008 年上海书展办了一个“改革开放 30 周年图书回顾展”，我有幸三套图书入选：80 年代主编的《五角丛书》，90 年代初编辑的《中华民族故事大系》和本世纪初总策划的《话说中国》。

这三套书在我 30 多年的编辑生涯中所占的分量确实很重，但我内心更看重的，是我从 1974 年开始参与编辑，直到今天仍在默默耕耘的《故事会》杂志。30 多年的编辑工作，我参与编辑的图书近千种，担任主编的杂志 5 种：除当了 30 年主编至今还没有卸任的《故事会》外，还当过《旅游天地》、《艺术世界》、《秀》、《金色年代》的社长或主编。但 30 多年的出版工作，有影响的就是三套丛书和一本杂志。这样的结果，也多少反映了出版工作的规律。

《五角丛书》总共出版了 150 多种，平均印数在 100 万册以上。它绝不是简单、粗糙、快餐式的出版，而是将某一类全新的文化信息根据读者的需求加以浓缩。许多书稿，在作者的认可下，都是从 10 万甚至 20 万字中精编出来的。尽管只有 96 面，但没有水分，含金量高，难怪至今仍有不少读者保存着这套丛书。大众出版如何为读者着想，既价格便宜，又内容充实，在今天中国的图书市场，仍然呼唤这样的出版精神。如人生能够重来，也许我仍然想编一套内容新、没水分、价格低、容易读的小丛书，我深信，中国的图书市场需要这一类作品。

《中华民族故事大系》在少数民族文

回忆 1993 年，有一天总编室的同志拿来一份广告的版本式，希望我题写一段广告词。我写道：“辽宁教育出版社敬告旧友新知，我们的理念：为建立一个书香社会而奠基！”

从此，“书香社会”成了我们的口头禅；“奠基”二字成了我们出版实践的指针。30 年来，我们最大的理想，就是做一些大众文化的普及工作；其标志性的产品，正是 1996 年开始推出的“新世纪万有文库”。这套书分古代文化、近世文化和外国文化三个书系，以优质、廉价、易存、耐读、平民化为宗旨。在 7 年多的时间里，陆续推出 6 辑约 600 多种图书。当时，我们的广告语是：“我读，故我在”和“爱书人，你的简装书来了”。

“新世纪万有文库”初版面世时，新华社以《面向大众——出版界的新选择》为题发了专稿，极力赞扬“情趣向上，眼睛向下”的出版精神。此后 10 多年间，人们一直关注着这套书的出版，不断品评它们的意义与质量。前不久还有人问我：“编这样的书，你是怎么想的？”我用一贯的口吻答道：“当时只是想搞一点文化保存。”“新世纪万有文库”的总策划沈昌

中国文化三十年

三套书和一本杂志 见证出版历史

何承伟

化建设中影响很大。我在编辑《故事会》杂志的同时，参与民间文化的图书出版工作。有些少数民族有他们的语言，没有他们的文字。他们用口头故事记录着自己民族的文化与历史。将他们的民族语言翻译成汉语，出版一套集 56 个民族于一体的故事大系，是件很有意义的事。令人欣喜的是，“改革开放 30 周年图书回顾展”将这套书列入其中，它使我醒悟到，填补空白，传承文化，至今仍是出版工作者的责任。

《话说中国》是一套大众历史读物，它用讲故事的方法讲历史，出版的初衷与《故事会》有关。“有大刊，必有大书”这是世界期刊出版大家的豪言壮语，他们用书刊互动的出版方式塑造自己的品牌，中国的期刊出版人为什么不能？我把人生的主要心血都奉献给《故事会》这本普普通通的小杂志，我要设法把它的事业做到极致。十几位史学家写了 2 年，编辑团队做了 6 年。这 6 年，我们是在创造一种形式，以求更好表现内容，适应今天读者的需要。我们以后发制人的战略进行创新，在世界范围寻找新的出版模式，甚至采用杂志、网络及其他媒体的表现手法，使得这套 16 卷 4800 面的大书可以从任何一阅读起。《话说中国》感动了中国读者，至今已创造销售码洋 1.8 亿

“新世纪万有文库”

为了大众的书香社会

俞晓群

文，更是一语点破了其中的本义：“保存为名，启智为实”。结果一个“启智”，引起了人们更多的思考。

其一，何谓启智？我们知道，总结改革开放 30 年，人们总好把前 10 余年的文化热，类比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及此后的思想启蒙时代。有些人干脆把那个年代，称为中国的启蒙时代。我想沈先生的启智，一定是在这一层意义上说出来的。

其二，为什么要启智？因为复兴与启蒙的主旨，是人的解放，是民众主体意识的觉醒。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文化的普及与传播。上世纪 80 年代以降，我国的出版界出现了一轮又一轮的文化热，一会儿西学，一会儿国学，时而丛书，时而套书，它们正是大众思想启蒙或曰启智的具体表现。没有这样的基础文化建设，任何解放思想、实现现代化的强国梦想，都将成为一句空话。在这一层意义上，启智的目的就十分清楚了。

其三，如何启智？就出版而言，方法很多。“新世纪万有文库”借鉴了英国“企鹅丛书”、日本“岩波文库”的方式，更是走的当年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的路

编者按：

今年是改革开放 30 周年。回望那个激动人心、朝气蓬勃的岁月，在真理标准大讨论和“读书无禁区”口号的催生下，一股持续近十年的“读书热”席卷全国。读者如饥似渴的阅读热情令许多图书创下了今天难以想象的发行量。在这 30 年中，一大批以“集团军”形式出现的丛书，以其庞大的规模、新鲜的选题、精良的编译吸引了大批读者。30 年过去了，读者并未忘记这些陪伴他们度过自己青葱岁月的好书。正如一位读者所言：“有些书注定要被岁月打磨得闪闪发光。”

无论是《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经典性，还是《五角丛书》低价策略，抑或《新世纪万有文库》的老书翻新，在当时都是领风气之先的得意之作。今天，在国民阅读率逐年下降，阅读习惯趋向快餐化、实用化，图书价格不断攀高令读者叫苦不迭的情势下，重新翻看这些散发着岁月气息的丛书，思考当年的编辑出版思路，对今天的中国出版界当不无裨益。

元的奇迹；《话说中国》

走向了世界，国家领导人把它作为国礼赠送给世界友人，美国《读者文摘》购买了海外的版权。《话说中国》是在改革开放后期出版的，这套书的成功告诉我：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用多出书的方式满足读者市场的需要，那么今天就要通过创新来满足读者市场的需要，努力扩大出版物的社会影响力，这也成了我们新的追求。

至于《故事会》杂志，30 多年来，我见证了它的发展和壮大。这本从改革开放初期发展起来的杂志，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发行量就位于中国期刊的第一梯队，至今还稳居中国杂志的第一梯队，而且与同类杂志保持着 10:1 的差距，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不少同行喜欢问我长盛不衰的秘诀，有时我觉得三言两语说不清楚，有时我又觉得是那样的简单：我很珍惜这样一个每月为 500 多万读者服务的机会。期刊出版人周而复始的工作需要动力，这真正的动力不是来自领导，来自金钱，而是来自读者。如今，无论我走到哪里，几乎都能遇到我们的读者，都能听到“我是看着《故事会》长大的”，这难道不是出版人最大的动力和最美好的享受吗？作为一个普通的出版人，我没有殷实的财富，却有着寄托心灵的文化殿堂。

这 30 多年，我的家搬了几个地方，但上班仍在上海很有名的出版一条街——绍兴路上。这条只有几百米长的小路，对我来说，却好像永远也走不完……

子。这几套书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都产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愿望都是为大众阅读提供精品图书，方法都是运用简装书的形式

降低书价，使平民读者能够买得起那些以往“精装、昂贵”的好书。它们的不同之处也是有，“企鹅丛书”的设计是浪漫的，橙色书脊系列为经典小说，蓝色是传记，绿色是侦探故事；“岩波文库”也是浪漫的，不同的书系缠着不同颜色的腰封：绿色是日本文学，红色是外国文学，白色是社会科学，蓝色是哲学和历史，黄色是日本和中国古典名著；我们的“万有文库”，却是统一的单色包装。更大的不同是时至今日，“企鹅丛书”与“岩波文库”都在继续出版，并且举办着盛大的出版 70 周年、80 周年庆典；而在内地，我们的“万有文库”，却早已经“二世而亡”了。

我崇拜上述几套丛书的文化精神，希望继续它们优良的东西，这也正是“新世纪万有文库”组建的思想基础。当然，其中最让我敬重的还是王云五先生的“万有文库”。我曾经开玩笑说，亏得王先生出版两辑就停了下来，使我们还有书可做，使我们还有沿用“万有”一词的机会，使我们的市场开拓有了承继前贤的借口。其实，他的两辑已有 1700 多种、4000 多册了，我们的 6 辑还不止 600 种。见到这样的数字，我还笑得出来么？

无形胜有形的领导魅力

——评《领导干部大讲堂·领导艺术卷》

蓝流芳

方面更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领导魅力是一种领导艺术，更是一个领导干部个人能力、境界和修养的综合表现。领导魅力不是天生的，是通过后天持之以恒的实践锻炼和学习所形成的。俗话说，“打铁先得自身硬”，一个关系一方水土、一个单位发展前途的领导干部，必须十分重视自己的领导魅力修养。

领导魅力始于理想，富于爱心；勇于创新；敢于负责，善于应变；富于幽默；勤于务实；趋于完善；成于坚持。在领导活动中，以高尚的品德服人，以真挚的情感动人，以知识和智慧赢

自己的榜样正人，从而赢得广大群众的信赖认可，真正树立起有魅力的公仆形象。

《领导干部大讲堂》包括资政卷、史鉴卷、文化卷、法治卷、礼仪卷、领导艺术卷，以丰富的知识和大智慧塑造魅力领导，以高端的人文素养浸润读者心灵。全套丛书框架严谨，气势恢弘，重视研究时代特征，把中国的发展纳入国际视野和历史视野进行考察，并注重研究和借鉴其他国家的实践和经验，知识理论与实践并重，突出历史与现状、问题与对策等，集纳各方面思想的风华。丛书涉及政治、法治、经济、

讴歌改革开放 重温伟人思想

——评《论邓小平》

王伟光

党的坚强领导，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等原因以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积累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正因为如此，作者热情讴歌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指出，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实行改革开放，都是历史的必然，而后者又是前者合乎逻辑的继续和发展。坚持社会主义，就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就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

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邓小平对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内涵及重大意义，都有精辟的论述。在论述邓小平这些思想基础上，作者指出，我们党是执政党，执政党最容易犯的、也是最危险的错误，就是脱离群众。我们党在历史上犯过的几次大的错误，虽然有许多具体的教训，但是最根本的教训是脱离了中国国情，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今天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要坚持改革发展为了人民，改革发展依靠人民，改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作者认为，解放思想是一个不间断的历史过程，虽然不同时期和阶段的主题和重点有所不同，但却有几个共同的显著特点：每一次解放思想的主题都是时代和实践提出来的；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都有扎实的党内基础和群众基础；都解决了面临的重大问题，既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前进，又带来了思想理论的巨大进步。改革开放 30 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谋求发展的历史。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改革开放，需要继续解放思想。



今年重庆市举办读书月活动，图书大卖场里前来选购图书的读者人头攒动。

读书

文化、科技、历史等各领域，纵论改革发展战略，深刻分析当前改革热点话题；结合中国重要历史时期重要人物事件讲解，提出针对现实的有益借鉴；通过中外文化比较、文化根源及现象的剖析，挖掘中国文化创新的动力；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对提高领导艺术等方面做了专门深入研究和讲解。《领导干部大讲堂·领导艺术卷》、《领导干部大讲堂·礼仪卷》讲述了管理者提升个人领导素质的相关技能，读者可以从中学提高领导力的技能和方法，掌握领导艺术，从而在组织和带领团队的过程中充分展现领导魅力，有效保持和提高团队的战斗力。

“时代华语”杯读书征文